



星期文库

“文人的风骨”系列之六

铁血丹心文天祥

张燕峰

文天祥生活于南宋乱世,面对蒙古铁骑的入侵,他不畏强敌,奋起反抗,以生命践行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的大丈夫气节。他慷慨悲壮的英雄之举,激励了后世无数仁人志士为信仰奋不顾身,赴汤蹈火。

1275年,元军大举南下,临安告急,百官慌乱逃散。文天祥在赣州散尽家产,招募三万义军,毅然北上勤王,决意以血肉之躯撑起将倾之厦。他明知书生义军难敌蒙古铁骑,如同驱赶群羊同猛虎相斗。友人劝阻,他慨然道:“国家养士三百年,岂可无一人赴难?”声音之铿锵,如惊雷破空,震撼山河。

1276年,文天祥临危受命,以右丞相身份赴元营谈判。面对元军统帅伯颜的威逼利诱,他昂首挺立,拒不跪拜,厉声痛斥:“宋虽弱,宁死不辱!汝等以武力相迫,岂知天地间尚有‘义’字!”元军震怒,将其强行扣押。

被押解北上途中,文天祥趁夜冒险逃脱,历尽艰险,辗转回到南方,立即重新组织抗元力量,誓与元军血战到底。后转战福建、江西、广东,直至1278年在五坡岭兵败被俘。被俘时,他当即吞食“龙脑”,自尽未遂,面对元将张弘范,始终不跪,誓死不降。

1279年,元军押解文天祥前往崖山,张弘范一再逼迫他写信招降宋军统帅张世杰。文天祥严词拒绝:“吾不能捍父母,乃教人叛父母,可乎?”当船行至伶仃洋,文天祥一时百感交集,挥笔写下千古绝唱《过零丁洋》,以“人生自古谁无死?留取丹心照汗青”明志,张弘范看后,感念其忠肝义胆,竟不再逼迫。

崖山破,军中置酒庆贺,张弘范曰:“国亡,丞相忠孝尽矣,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,将不失为宰相也。”文天祥涕泪交加:“国亡不能救,为人臣者死有余罪,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?”张弘范感其仁义,派人护送文天祥到京师。

文天祥被押至大都(北京),元朝用尽手段劝降:先许以宰相之位,他答:“天祥为宋状元宰相,宋亡,惟可死,不可生。”后派已投降的宋恭帝赵㬎前来,他只说“圣驾请回”。元朝仍不甘心,又派降臣南宋宰相留梦炎游说,被他当众痛斥。又以酷刑折磨,在阴暗潮湿的土牢中他写下《正气歌》,表明“是气所磅礴,凛烈万古存。当其贯日月,生死安足论”的信念。

1283年,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劝降:“汝以事宋者事我,即以汝为中书宰相。”文天祥淡然一笑,坚定回答:“一死之外,别无所求。”

临刑前,他向南跪拜故国,从容说道:“吾事毕矣!”慷慨就义,年仅47岁。

沐浴在姥爷的关爱中

——纪念姥爷孙犁先生逝世24周年

赵 宏

书桌上常摆着姥爷的文房和书籍。书桌旁立着一个普通的书柜,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满了书籍。书柜外侧竖着一道木制屏风,仿佛将这一方角落与外界稍稍隔开,围出一个安静而独立的空间。这里既是姥爷读书写字的地方,也是他日常休息起居的场所。

姥姥和姨舅们住在里间的大屋里。另外一间屋子专门存放姥爷的藏书,很多书柜整齐地排列着,屋里很静,散发着淡淡的书香。

记得上小学时,每逢暑假回天津,姥爷总会让我把作文都带给他。我当时就读于棉纺一厂子弟小学,那时正值特殊期间,许多课上得断断续续。唯独教语文的老师,依旧认真地上好每一堂课。她批改作文时,喜欢用红墨水笔在写得好的句子下面画上线。那时,同学们判断一篇作文写得好不好,并不太看分数,而是看老师究竟画了多少道红线。现在回想起来,我那时的作文,倒也常常能得到老师不少“红线”的鼓励。

我每次把作文带给姥爷,他都会一篇篇仔细看。遇到他认为写得好的地方,便再用蓝墨水笔画出来,与学校老师的批阅区分开来。对于一些不太通顺的句子,则耐心地帮我修改。记得有一次,姥爷看完我的一篇作文后,便把我叫到身边,指着作文说:“这一段写得不错,事情讲得清楚,也讲得明白。”听到姥爷的夸奖,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接着,姥爷又说:“回头我给你找些书带回去。要多看书,作文才能写好。”

上世纪六十年代末,我居住的棉纺一厂宿舍区有一块足球场,每天都有许多人在这里踢球。我和几位从小一起长大的小伙伴耳濡目染,也渐渐迷上了踢足球。每天清晨,天刚蒙蒙亮,便相互叫起床聚在一起练球。下午放了学,又来到球场上,不踢到天黑看不见球了,绝不回家。每到星期天下午,足球场都会安排成年人的比赛。我们几个小伙伴便带着小板凳,早早守在场边,一看就是大半天。就这样,在日复一日的耳濡目染中,足球悄悄走进了我的生活,并逐渐成为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

13岁那年,改变命运的机会终于来了。当时河北足球队教练陈成达听说棉一学校有几个孩子球踢得不错,便派伊秋文教练专程前来考察选拔。选拔设在河北师范大学足球场,考核项目包括颠球、带球、传球和小场地比赛。经过一番测试,我竟然被选上了,并获得了进入河北青年足球队集训的机会。得知这个消息,我兴奋得几乎一夜未眠。在那个年代,能够进入专业足球队,是许多足球少年的梦想。然而,父母却迟迟不肯答应。他们觉得我年纪太小,离家训练不仅生活艰苦,而且运动员这条路充满未知,万一踢不出来,将来的工作和前途都难以保证。无论我怎样央求,他们始终不同意我去。

为了争取这次难得的机会,我急得连饭都不肯吃,用“绝食”来表明自己非

去不可的决心。面对我的固执和坚持,父母一时也没了主意。最终,他们给远在天津的姥爷写去一封信,希望听听他的意见。没过多久,姥爷回信了。信中没有讲什么大道理,也没有权衡利弊,只是表明态度:“小宏既然有这个兴趣,喜欢踢球,就让他去吧!”

有了姥爷的支持,父母终于打消顾虑,同意我去省队参加集训。从此,我的人生驶入了一条全新的轨道,也拥有了一段终生难忘的绿茵岁月。此后,我随队征战全国各地参加比赛;每年赴昆明海埂或广州二沙头训练基地冬训;并于1976年、1977年两次入选中国青年足球队,出国参加国际赛事。

回首往事,姥爷一生为文,淡泊名利,笔耕不辍。在家庭教育上,他同样身体力行,以立德、勤俭、本分为根本,从不以自己的声望为子女铺路,也不强求他们循着既定的人生轨迹前行,而是尊重每个人的兴趣、个性与选择。正因如此,几个子女都从事着自己喜欢的普通工作,自食其力,生活平实。姥爷对孙辈们的教育也格外宽容。常对儿女们说:“孩子是什么材料,就干什么事情,不要强求。”

1983年,我因腿部受伤,不得不告别为之奋斗了十年的足球生涯。那一年,我以国家一级运动员的资格被特招进入河北大学学习。从绿茵场走进大学校园,对我而言,无疑是人生道路上的又一次重要转折。

入学不久,班主任崔老师布置了一篇题为《入学感想》的文章。面对这个主题,我感慨万千,将自己从足球运动员到大学生的心路历程,以及对未来的憧憬,都倾注到了笔端。文章写了近3000字。写完后,我特意将此文寄给了姥爷。几天后,我收到一个从天津寄来的包裹。打开一看,里面静静躺着一个竹笔筒,还有舅舅孙晓达写来的一封信:“你姥爷让我给你回封信,说你的文章写得不错,希望你多读些书,多写点东西,充分利用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,好好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。这个笔筒是你姥爷送给你的,它跟随姥爷很多年了。姥爷说,你现

在上学、读书写文章,用得着它。”读完信,我心里一阵激动。没想到,姥爷不仅看了我的文章,还特意托舅舅写信鼓励我,还把陪伴他老人多年的竹雕笔筒送给了我。端详着这个笔筒,我兴奋了很长一段时间。笔筒有些年头了,竹色渐深,泛着古铜般温润的光泽。它以天然竹节雕制而成,筒身镌刻着“杭州西湖”四字,并饰以西湖风景图案为背景。远山含黛,近水生波。经岁月反复摩挲,竹面早已形成自然的包浆。

如今,这只竹雕笔筒依然摆放在我家中最显眼的位置。竹色因岁月而愈发深沉,爱意却在时光中愈加醇厚。它所盛放的,早已不只是几支笔,而是姥爷当年的谆谆教诲、殷殷冀望,以及那份伴我走过半个多世纪、始终温暖如初的爱。



1987年,外孙赵宏和外孙媳贾肇平与姥爷孙犁(前)合影。(张大纲 摄)

姥爷孙犁热爱家庭,疼爱儿女,也十分关爱他的孙辈们。这种爱,没有惊天动地的表达,却早已悄然融入血脉,浸润心田,伴随着我们的成长岁月。每当忆起姥爷,我们都会从内心深处生出一种温暖而深切的感恩之情。

姥爷姥姥育有一儿三女,我母亲是长女。1954年,为支援石家庄的建设,她从天津棉纺六厂调至石家庄棉纺一厂工作,并在那里成家立业,养儿育女。

1959年,我的降生,让姥爷姥姥家迎来了第一个孙辈。在我两岁那年,由于家人无暇照料我,便把我送到了天津,在姥爷姥姥家住了三个多月。那段日子里,姥姥宠,姥爷爱,姨舅们更是稀罕得不得了。

姥爷常常领着走路还不太稳的我,去看他养的金鱼和栽种的花草;他时常把我抱在怀里,站在阳台上眺望院中的景致。记忆中,有一张照片,正是姥爷抱着我站在阳台上的情景。那时的我安静乖巧,仿佛一个听话的孩子。可这样的“乖巧”并没有持续多久,在姥爷家住了没几天,我那淘气顽皮的天性便渐渐显露出来。姥爷在写给我母亲的信中,曾这样描述:“小宏非常可爱,非常聪明。就是胆忒大,人闲不住,什么都敢动,都敢摸。为了上到柜子上,把柜子的所有抽屉都拉开,踩着抽屉往上爬。”

母亲回忆说,我四岁那年,她带着我回天津。一天中午,姥爷正在吃饭,我却调皮地踩着凳子爬上了饭桌。姥爷见状,并没有责怪,只是赶紧把饭菜往旁边挪了挪。母亲见我实在不像样子,便想把我从桌上抱下来。谁知我哭着闹着,就是不肯。母亲正要坚持,姥爷却说:“让他玩吧,不碍事的,你不用管他。”

记忆中,每年小学暑假,母亲都会带我回天津看望姥爷姥姥。那时,姥爷住在多伦道216号的大院里,那是一座园林式庭院,树木茂盛,有假山、小桥和流水点缀其间,很是静谧。姥爷住在台阶上面正房的中户。推门而入,首先是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的小门厅,兼作厨房使用。穿过门厅,便来到三间南北相连的屋子,每个房间大约二十多平方米。

姥爷的床摆在外屋左侧最里面,紧靠着墙。床边放着一张普通的木制书桌,桌前是一把略显陈旧的藤椅。